

中西文化背景对清代广作家具的影响

安舜, 方海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 510090)

摘要: **目的** 18 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交融推动了广作家具的精进与创新, 不仅催生了新的家具门类也引领着全国的设计风潮。探讨广作家具的文化背景与艺术特色为广作家具的现代“演绎”提供创新与活化的新思路。**方法** 结合清代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等状况, 通过资料收集、文献分析和考察走访, 在实物案例中探究中西文化背景下清代广作家具的审美意蕴和内在价值。**结论** 广作家具沿袭明清传统家具的体系, 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 广作家具的奇巧华丽深受清朝皇室的喜爱, 于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在装饰风格上, 它兼容并蓄, 质美工巧, 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广作家具中西结合的风格特点; 在文化互融中, 以中国传统家具为基础吸收西洋文化元素, 使广作家具中西文化并存。

关键词: 清代; 广作家具; 中西文化; 装饰风格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1)06-0290-05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1.06.041

Influ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on Guang Style Furniture in Qing Dynasty

AN Shun, FANG Ha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9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18th centur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which not only spawned new furniture categories but also led the national design trend. The work aims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innovation and activation of the modern “deduction”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Combining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spection visit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and intrinsic value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were explored in the cases. Guang style furniture has develope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urniture 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has high historical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Under a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Guang style furniture was deeply loved by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development reaches its peak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In terms of decorative style, it is compatible with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furni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integration of cultures, it absorbs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furniture, and mak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exist in Guang style furniture.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Guang style furnitu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decorating style

广作家具又称广式家具, 是指在广州及粤周边地区生产制作的家具。它起源于明末清初, 盛行于清朝

中后期, 与京作和苏作家具共同组成清代“三作”家具。其中广作家具产品最为突出, 得到清朝统治者的

收稿日期: 2020-09-15

基金项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 2019 年度重点课题 (2019GZWTZD08); 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粤港澳设计文化与战略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 安舜 (1989—), 女, 山东人, 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与创意产品。

通信作者: 方海 (1963—), 男, 江苏人, 博士, 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具设计与理论。

青睐。它体态端庄、用料粗壮、装饰繁复、工艺精湛,既传承了中国的造物精神,又接受了西方古典艺术的思潮,是中国传统家具的典型代表之一。田家青在《清代家具》和《明清家具鉴赏与研究》两本书中分别提到,广式家具充分吸收外来文化,良好地融合了中西艺术^[1],西洋纹饰与中国纹饰相结合构成了新的图案^[2]。清代唯一留存的家具图样《广东五常酸枝家私》,以写实的画法绘制了一批特色突出的广作家具。从纹饰图样可以看出它大胆地吸收了西方设计元素,打破中国传统家具制作的行文条框,与西方艺术完美地结合。

1 广作家具产生之社会背景

广州地处南海之滨,自秦汉以来即是中外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前沿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之一。16世纪以降,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商贾携西洋物件来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艺美术逐渐得到明清两代宫廷的青睐。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值巴洛克与洛可可的盛行期,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3]。位于中西交往前沿地广州的工匠们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技艺,他们将西方艺术思想与创作技法带入中国传统手工艺中,由学习技法和模仿样式到创新设计,形成了以广珐琅、外销画和广作家具为代表的新兴手工艺。18世纪,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中国长技”制作出既有地域元素又有时代特征的广作精品畅销海内外,频繁的外销品贸易进一步影响到了家具的设计与制作。此时的广作家具大量出口外销,它展示了最典型的中国设计思想及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的中国家具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制作技艺^[4]。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4个省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并独在广东设立“粤海关监事”一职^[5]。粤海关监事通常由皇帝亲自指派,负责管理和监督广东进出口贸易的工作,在其管辖下大小关口多达70余个,地位堪比巡抚,亦可直接向皇帝汇报,这也是中国古代新海关制度的伊始。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一度关闭了江、浙和闽三处海关,使得广东成为中国唯一一处合法开放的口岸。“一口通商”政策使省城广州成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汇地^[6],酸枝家具、工艺品、茶叶和丝绸等物品的出口与紫檀木、花梨木、鹛鹁木等珍贵木材的进口业务都在这里完成。《广州年鉴》卷十七记载,家私行,该行计有酸枝柏椅、西式家私和木器家私三种,其中酸枝家私年前出口最为大宗^[7]。由此可见,广州酸枝家具成为当时出口的畅销产品。

在此背景下,由牙行、商行和洋行组成的闻名遐迩的“十三行”也逐渐形成,专门负责管理广州的对外贸易。十三行位于广州的南端以及城墙以外的西关,这里洋货聚集,商铺林立,水路交通便利,成为

外销家具、手工制造业和进出口贸易的理想之地。清代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可见十三行当年的兴旺场景,这也是关于广州十三行的最早的文字记录。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和《清代广东贡品》等资料记载,雍正年间广东省已开始向宫廷进贡木作家具,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亦在乾隆元年(1736年)特设“广木作”,招募优秀广东木匠进入紫禁城中服务,专事皇家家私,于乾隆中期广作家具达到鼎盛时期。雍正、乾隆年间广东官员进贡的部分家具见表1^[8]。

从表中可以看到,雍正后期广作家具得到皇室的青睐,连续4年进献的贡品中已逐渐包括5种家具品类,虽然数量不多但这预示着广作家具的发展与兴盛。乾隆时期粤地官员进献家具的数量呈明显的递增趋势,时间跨度从乾隆三年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此时的家具样式比较考究,品类包括书桌、宝椅、屏风和香几等14种。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广作家具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基于“一口通商”政策的实施和清王朝皇室的喜爱。

2 广作家具装饰之中西风格

艺术不分国界,中国明式家具在16至17世纪时就得到西方国家的借鉴和收藏^[9]。18世纪中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于此同时,在欧洲文化艺术史上巴洛克风格(Baroque Style)和洛可可风格正风靡一时。巴洛克风格造型奔放,形式夸张,雕琢细腻,追求浪漫华丽的装饰;相比于宏伟辉煌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更显华贵柔媚,其家具造型优美,做工精巧,追求线条的流畅和婉转,常用“C”形和“S”形的曲线来处理家具的轮廓^[10-11]。至19世纪初,这两种风格很快在中国建筑和广作家具中被广泛运用,呈现出浓郁的西方装饰风格。

雍正乾隆当朝,清廷国力强盛,国库充盈,达官显贵不断地追求生活上的豪华气派,大规模模仿西方的建筑风格家具样式,例如北京西苑修建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其建筑从室外形式到室内家居摆设无一不受到西洋风格的影响。为此,清廷每年定期从广州采办或制作大量与建筑风格相协调的中西结合式家具,即以中国传统作法制成器物后,再用雕刻和镶嵌等工艺技法饰以西洋纹样。其中西番莲纹、贝壳纹、卷草纹和涡卷纹等不仅应用在柜架类家具构件中,也常常出现在桌椅家具的结构支撑件里^[12]。作为真实植物存在的西番莲大约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了一种西洋莲:“蔓细如丝,朱色,缭绕篱间”,其藤蔓柔软纤长,常攀爬缠绕于篱笆间。它与历史上人为创造的西番莲纹相似,人们遂将此名赋予之,此外“西番”二字正好符合其外来的

表 1 雍正、乾隆年间广东官员进贡的部分家具
Tab.1 Some furniture paid as tribute by Guangdong officials in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进贡人	官职	进贡时间	进贡物品
郝玉麟	广东总督	雍正八年（1730 年）	玻璃镜二座、玻璃书柜二架
祖秉圭	粤海关监督	雍正九年（1731 年）	雕画玻璃炕屏一架
杨永斌	广东巡抚	雍正十年（1732 年）	万寿屏一架、紫檀柜二架
杨永斌	广东巡抚	雍正十一年（1733 年）	万寿镜屏二座
郑伍赛	粤海关副监督	乾隆三年（1738 年）	玻璃炕屏一座
策楞	两广总督	乾隆十二年（1747 年）	玻璃炕屏一座
策楞	两广总督	乾隆十三年（1748 年）	三羊百禄玻璃插屏一对（随座）、画玻璃挂屏一对、画山水玻璃挂屏一对
硕色	两广总督	乾隆十四年（1749 年）	紫檀文榻一对、画玻璃紫檀挂屏一对
唐英	粤海关监督	乾隆十六年（1751 年）	掐丝小香几一对、紫檀书桌一对、玻璃小插屏二十座
杨应琚	两广总督、	乾隆二十年（1755 年）	紫檀宝座一尊、紫檀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七屏风一座、紫檀宝凳四对
李永标	粤海关监督		
德保	广东巡抚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	紫檀屏风宝座地平全份、紫檀书格成对、紫檀宝椅十二张、玻璃照衣镜成对
李侍尧	两广总督	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	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雕云龙大柜一对、紫檀雕花大案一对、紫檀雕花香几一对
长麟	两广总督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	御制句象马图挂屏一对、玻璃芙蓉花挂屏成对、御制攒十八罗汉挂屏一对、玻璃月桂花挂屏成对
朱珪	广东巡抚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	御制八徵耄念、十全老人之宝说挂屏一对、御制墨云室记、李廷圭古墨歌挂屏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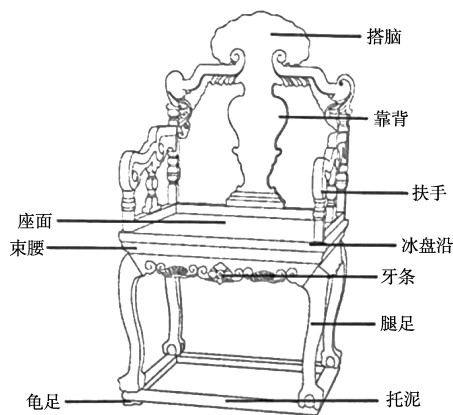


图 1 紫檀西番莲扶手椅构件图
Fig.1 Component diagram with purple sandalwood armchair with passion flowers



图 2 紫檀西番莲扶手椅
Fig.2 Purple sandalwood armchair with passion flowers

地域身份。这一种人为构成的纹样集荷花与牡丹于一体，在中国传统装饰纹样中亦称宝相花。它富丽华贵，装饰性强，针对“缭绕”这一特性，饰于器物上的枝叶多作循环式，衔接巧妙，难辨首尾，视觉上贯穿一气，连绵不断。其构图形式通常以一朵或几朵花为中心，花瓣根部作圆珠规则排列向四周伸展，可以根据不同的器形和装饰部位随意延展，符合中国文化的审美需求。

紫檀西番莲扶手椅就是典型的中西风格结合的产物，紫檀西番莲扶手椅构件图和紫檀西番莲扶手椅见图 1—2。该扶手椅的搭脑雕有巴洛克风格的贝壳

式莲瓣纹，中式宝瓶状靠背板上雕有西番莲纹，靠背边框和扶手短柱等处皆采用柱式造型，与背板雕饰风格一致。座面格角攒边，平镶板心，座面下沿雕有花瓣纹样，束腰上雕有卷云纹，其下牙板沿边起阳线，中垂十字花，腿上部雕有西洋花纹。三弯式四腿，足端雕有狮爪抓珠式造型，四角带龟脚，下踩方形素托泥。

紫檀西番莲扶手椅是乾隆时期广作家具的代表之一。它造型传统，以中式为主西式为辅，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逐渐表现出雄浑、稳重、繁缛和华丽的造型风格；纹饰较多地吸纳了西洋元素，新奇而不失庄重，以轻快的贝壳形曲线和精巧的植物雕饰打破了

传统家具的平静肃穆。它符合乾隆对家具质美工巧的要求,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广作家具中西结合的风格特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由于融合了西方艺术的特点,所以广作家具的装饰题材和工艺手法及其丰富,除了常见的西番莲纹、卷草纹和贝壳纹等西式纹样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传统纹样,如植物类的松、竹、兰、梅和菊等,动物类的鹤、鹿、狮、羊、蝙蝠和鸳鸯等,还有常见的夔龙纹和凤鸟纹等。工艺上常用的传统雕刻技法有浅浮雕、浮雕、高雕、通雕、圆雕、立体雕等,线刻常用来表现细小的元素和雕饰,雕刻面积往往宽广而纵深。此外在西方装饰风格的影响下,广作家具也开始逐渐镶嵌珐琅、琉璃、宝石和螺钿等广东地区特有的云石材料,镶嵌集中表现在座椅靠背、桌面和牙条等部位。其多种工艺手法融合互通,装饰题材与家具造型搭配变化,显现出广作家具中西风格兼容并蓄的特点。

3 广作家具文化之互融互鉴

家具从无到有,从品类单一到形制复杂,时至今日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物质文化演变的历程中,广作家具彰显出来的是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外在审美意蕴和内在文化积淀。

在对外交流较早的清代,由于内外贸易的需求和外来家具式样的大量加工,使得广作家具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渗透了西方传入的家具形式和西洋元素,结合广府民俗和审美意象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少优秀作品至今仍是令人赞叹的工艺杰作。然而清朝也是中国文化借用外来因素达到高峰的一个时期,这主要得益于乾隆时期“一口通商”政策的颁布,畅达的交通和频繁的交流,使广州垄断了海上贸易近一个世纪之久。广府地区的家具制作也是良才汇聚,行会林立,巧匠云集,融西洋文化之先,一跃成为领衔京作和苏作等地方家具流派的清式家具的典型代表。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中国传统造物讲究顺应季节时令,地理条件适合,材料品质上佳,工匠技艺精巧,四者有机结合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广作家具追求雄厚、庄严、豪华和富丽的风格,使用了多种材料和技巧,运用了中西方不同的工艺手法,雕饰面积大大增加。其外在表象为用料厚重,不喜拼接,无论家具构件的弯曲度多大,都用一木挖成,整材挖空,追求木质的统一^[13]。

2019年12月于广东省博物馆特展的紫檀雕花嵌珐琅扶手椅,见图3,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互融下的产物。该椅的搭脑用一块长51 cm、宽18 cm、厚6 cm的板材刮削成3.5 cm厚的弧形板,在板上用镂雕的手法雕刻勾卷云纹,象征意义深邃;靠背板用一块厚5 cm、长46 cm、宽25 cm的木板,削刮成2 cm厚的



图3 紫檀雕花嵌珐琅扶手椅

Fig.3 Purple sandalwood armchair inlaid with cloisonné enamel

洛可可风格的“S”形曲线板,以半踩地手法雕刻如意拐子纹;靠背上部镶嵌黄杨木雕磬纹,中部镶嵌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心板,背面正中以浮雕刻有西式珠花一枚;椅面厚3.2 cm,有高2 cm的低束腰^[14]。其下方材直腿,四面装如意头券口牙子,四面平式素枱装如意头雕花牙条。此椅雕饰精致,紫檀木、珐琅心板和黄杨木嵌饰之间的色彩对比正是匠心独运之处,既展现了清代繁缛复杂的装饰风格,也彰显了独特的工匠技艺。从椅身各部分的比例来看,坐面宽度大于高度,纵向尺寸几乎与高度相等;用料方面不论腿足和背板的弯曲度多大,都用一块木料刮削而成,与寻常椅子相比耗材更多。紫檀雕花嵌珐琅扶手椅集端庄、舒适、严谨和权威于一体,给人以稳重大方之感,观之令人印象深刻。

广作家具根植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背景,巧妙地展现了器物中蕴含的内在文化价值^[15]。它在中西方文化频繁的交融互补下蓬勃发展,创造出大量的生活家具。清中晚期至抗战前夕,广府地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庶,造园之风蔚然,大量兴建的岭南园林持续带动家具制造业的不断壮大,进而辐射珠三角一带,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家具制造业。

4 结语

几个世纪以来,广作家具因开放创新而发展壮大。在中华文化的熏陶下,仍沿袭明清传统家具的体系向前发展。无论古今,无关中外,一切家具的艺术造型和文化价值,只要符合审美造型规律和工艺制作原则,其形式上无论是简洁朴素的,还是华丽繁缛的,同样可达臻美之境。古代的设计者往往就是制造者,他们融设计与制作于一身,先画出图样再根据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况进行适当地调整或改进。一件器物经过工匠一斧一凿的洗礼和丝丝情感的润化,渗透出来的是中国的智慧和把生命融入器物的东方造物精神。然而现代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是分工合作

的,因此更要求设计者和制造者具有良好的文化底蕴和艺术素养,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脚踏实地地进行实践,从而将传承、创新与活化带入广作家具的现代“演绎”之中。在家具行业互鉴之风日盛、交流日趋频繁的环境下,如何把传统家具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赋予新时代的特色,是未来将要探讨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田家青. 清代家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TIAN Jia-qing. Qing Dynasty Furniture[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2] 田家青. 明清家具赏析与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TIAN Jia-qing. Appreciation and Research of Ming and Qing Furniture[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3] 门超. 明式家具中椅子的审美特征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8(9): 11-13.
MEN Chao. Study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airs in Ming Style Furniture[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18(9): 11-13.
- [4] 方海.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FANG Hai. Chineseism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7.
- [5] 葛芳. 西洋风物——18世纪以广州为中心的设计文化研究[D]. 南京: 南京艺术学院, 2017.
GE Fang. Western Scenery: A Study of Design Culture with Guangzhou as the Cent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D]. Nanjing: Nanjing Arts Institute, 2017.
- [6] 周京南. 厚重凝华、融贯中西——论广式家具对清宫家具的影响[J]. 家具, 2010(1): 68-72.
ZHOU Jing-nan.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Combined with Western Features: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 to the Furniture in Palace of Qing Dynasty[J]. Furniture, 2010(1): 68-72.
- [7] 蔡易安. 清代广式家具[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CAI Yi-an. Guang Style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1.
- [8] 广州博物馆[EB/OL]. (2019-11-10)[2019-11-10]. <http://www.guangzhomuseum.cn>.
Guangzhou Museum[EB/OL]. (2019-11-10)[2019-11-10]. <http://www.guangzhomuseum.cn>.
- [9] 方海. 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FANG Hai. Chineseism in Modern Furniture Design[M]. Beijing: China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ess, 2007.
- [10] 徐士福. 洛可可风格在清代广式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19(1): 32-33.
XU Shi-fu. Application of Rococo Styles in the Cantonese-Style Furniture of Qing Dynasty[J]. Furniture & Interior Design, 2019 (1): 32-33.
- [11] 朱云. 西方古典艺术对广式家具的影响探析[J]. 包装工程, 2018, 39(14): 158-161.
ZHU Yu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lassical Art on Guang Style Furniture[J]. Packing Engineering, 2018, 39(14): 158-161.
- [12] 朱云. 广东传统家具的特色分析[J]. 包装工程, 2018, 39(16): 236-242.
ZHU Yu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Furniture in Guangdong[J]. Packing Engineering, 2018, 39 (16): 236-242.
- [13] 叶勇军, 朱慧慧. 中国传统家具流派之广作家具探究[J]. 美与时代, 2018(4): 87-89.
YE Yong-jun, ZHU Hui-hui. Research on Guang Style Furnit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urniture Type[J]. Aesthetics, 2018(04): 87-89.
- [14] 胡德生. 清代广式家具[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6(10): 13-18.
HU De-sheng. Guang Style Furniture of the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the Palace Museum, 1986(10): 13-18.
- [15] 何盛. 中国传统造物智慧在智能化时代下的启迪创新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6): 353-359.
HE Sheng. Innovation Desig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reation Culture in Intelligence Era[J]. Packing Engineering, 2020, 41(16): 353-359.